
中外名记者丛书

爱泼斯坦

张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北京

责任编辑：颜景政

封面设计：郑炳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泼斯坦/张彦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8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59-3

I. 爱… II. 张… III. 爱泼斯坦-评传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0252 号

爱泼斯坦

中外名记者丛书

著 者：张 彦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199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发行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北京科技印刷厂

印 数：7000

印 张：6.5 字数 160 千字

ISBN 7-80002-859-3/G·260

定价：8.30 元

目 录

人物评传：	(1)
-------	-------

序	范敬宜 (1)
走过一条奇特的道路	(1)
在抗日烽火中锤炼	(17)
对外宣传的大师	(39)
写人贵在神似	(49)
记者的基本功	(59)
良师和益友	(69)
后记	(74)

作品选编：	(76)
-------	--------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76)
采访毛泽东	(91)
亚洲在发生什么事情？	(99)
亚洲为何仍然落后？	(107)
开滦煤矿——从帝国主义的领地 到人民的企业	(115)
重访台儿庄	(125)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	(134)
80年代的西藏变革	(139)
回忆埃德加·斯诺	(146)

《宋庆龄——20 世纪的伟大女性》节录：	(158)
爱情·革命·理想	(158)
宋庆龄在家中	(162)
帮助国共高层的初期接触	(166)
三姐妹同赴重庆：为了团结抗日	(170)
生平年表及著作目录	(177)
年表：	(177)
著作	(183)

人物评传

走过一条奇特的道路

“中国人一般是由爱国主义
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
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

1995年4月20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喜气洋洋。一个个祝贺生日快乐的巨型花篮，散发出阵阵玫瑰的芬芳。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正在这里亲切会见中国籍的外国老专家、政协常委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热烈祝贺他在华工作60年暨80寿辰。他们一致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国际宣传和对外传播事业，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满脸笑容的江泽民，一面翻阅着手里那本刚刚出版的《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一面高兴地赞扬这是一本有利于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了解的好书。

随后，一个在更大范围举行的庆祝茶话会开始了，讲话一个接着一个，高潮迭起，都以无限敬仰的心情列举着这位

不寻常的老新闻工作者所作的突出贡献。但是，今天的中心人物、老寿星爱泼斯坦，最后站起来面向数以百计的客人们致《答谢辞》时，四座不免为之一惊。他说：

“今天，在西方传媒中，对中国的攻击多于赞扬。抓住缺点，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捏造的，就大做文章、无限夸张。对成就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勉勉强强地、酸溜溜地稍加承认。中国不论做什么总是错的，这成了现在一种时髦的风气。中国人口增长，就说世界人口要爆炸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又说剥夺了没有出生的小生命的生存权。中国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困难，说中国整个体制不对头；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又说中国要成为全世界第三号、第二号、甚至于头号强国，一步步要成为一个危险的军事超级大国了！所有这一切，不必使我们感到无谓的烦恼。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不是别人在说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自己说了些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怎么说，只要说的是合理的和真实的，是会产生效果的。即使不能马上立竿见影，以后也会产生效果。如果我们把自己描绘得完美无缺，那么来中国的人们回去以后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但是那些受西方传媒影响、以为中国一团漆黑的人，他们来中国后回去却会说：‘比他们说的好得多。’

“因此，只要我们做得对（如果做错了就改正），我们就不必为‘形象’过分担心。我们的工作阐明我们的作为和信念，而不是像推销化妆品那样去抓住眼前的买主。当然，我们也不能对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为我们制造的虚假‘形象’置之不理。我们不必去回答每一条谰言，而是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功夫。我们必须突出我们的长处，并学会用新颖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开中药铺’，或翻来覆去老一套。对于确实存在的缺点，我们应该用实实在在的改正措施和取得的效果

去说服人们。我们不应该单纯模仿，把别人立下的标准通通照搬。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显示，我们珍惜我们自己的优良准则。

“尊重自己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相信自己的人，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

说这一番话时，身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个子不高的爱泼斯坦，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实在难以令人相信，他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他的声音和十年前做 70 大寿时一样铿锵有力，一样意气风发。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他的《答谢辞》竟如此地不同凡响。没有客套，言之有物，甚至还包含着批评和建议。深知他者都说：“这就是艾培！”“艾培”是人们对爱泼斯坦的昵称，如今也就成了他的中文名字，熟悉他的朋友们都喜欢这样称呼他。

这个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从来不说言不由衷的“空话”，尤其不会说那令人厌恶的“套话”。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本能地把自己和所从事的事业融为一体。所以，即使在今天这样为他隆庆祝寿的场合，他说的依然是：

“我多年来一直在对外宣传战线工作，所以我想就对外宣传谈一点想法，供大家评论和考虑。”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不仅头版刊登了为爱泼斯坦祝寿的新闻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他握手的巨幅照片，而且在第四版上以加框的显著地位全文发表了他的《答谢辞》，看得出来，曾经亲自来参加庆祝会的这家报纸的总编辑范敬宜，对这篇颇不寻常的《答谢辞》情有独钟，俨然是把它作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来对待的。

十年前的同一天，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和二三百位各界嘉宾，前来参加庆祝爱泼斯坦 70 寿辰大会，济济一堂，隆重热烈。在座的贵宾当中，有邓小平、邓

颖超这样令人一听名字就肃然起敬的革命元老。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专门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称赞他“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手书的祝词是四个大字：“德高志坚”。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贺词则是：“祝贺勤奋参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52 年的国际战友爱泼斯坦同志 70 寿辰”。

祝寿大会开始前，邓小平在单独向爱泼斯坦表示祝贺时，曾经这样对他说：

“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五年冤屈以后又重新起来积极地为我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受过六年的冤屈。”

邓颖超在致祝辞的时候，曾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起一段难忘的往事：在日本侵略者 1937 年侵占天津以后，是爱泼斯坦和斯诺想方设法帮助她逃出了虎口。

沉浸在如此温馨的幸福感之中，爱泼斯坦也是以一篇与众不同的《答谢辞》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激动心情。他说：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风云激荡的世纪中，世界变革的浪潮把我带到了中国人民之中。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继前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之后，中国革命成了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伟大的分水岭。继之而来的 1917 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又一个迈向新的制度——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伟大的分水岭。社会主义，同其他所有新生事物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不经受磨练、出现错误和进行试验。通过我的身世和所受的教育，我接受了上述这些革命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得以为中国的革命和新的建设事业效力。我感到，没

有什么事情比这样做更愉快了。

“我深深怀念我曾有幸结识的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宋庆龄同志和其他同志，所有这些同志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引导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前进。我还怀念许许多多的其他同志，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还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我的同事们在内。他们的言谈话语，更多的是他们无言的行动所树立的榜样，使我深受感动。今天在这个大厅里，有许多朋友和同志曾经在不同时期和我一起生活和工作过，我的成长也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其中包括我在《中国建设》的同事们给我的许多帮助。”

同样，对于爱泼斯坦 70 大寿的庆祝活动，各种新闻媒体都作了广泛报道。可是，两天以后，英文《中国日报》上却出现了一封“读者来信”，标题是：“这是不真实的”，署名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我感谢《中国日报》就我 70 寿辰所作的很好的报道。

“然而，最后两行说埃德加·斯诺和我两人‘共同写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这是不太准确的。我们二人的确彼此非常熟悉，而且 1937 年在北京出版的《民主》杂志共过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合写过什么东西，总是分开写的，他写得比我好。以上只是为了纠正一个事实。”

短短一信，寥寥数语，显示出爱泼斯坦的为人：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绝不掠人之美。

80 年前的同一天，也就是 1915 年 4 月 20 日，当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的华沙城里的时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场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战争，从欧洲逐渐扩展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到 1918 年，已有 30 个国家

卷入了这个战争，不知多少国家的士兵和百姓死于非命，千千万万人无家可归。与此同时，随着交战国经济危机的严重化，各地人民的革命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集中的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高举反战的旗帜，不断展开斗争，形势正处在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前夕。

位于东欧腹地的波兰，当时也正处于漩涡之中，同样是极不平静，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爱泼斯坦的父亲拉沙尔和母亲松亚，也卷入了反对俄国沙皇残酷统治的运动。由于他们是犹太人，到处受到歧视，反抗性就更强烈。他的母亲因此曾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恰恰是在那里，她从许多久经锻炼的革命者身上学到不少珍贵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会计工作的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因为西欧和大西洋方面已被战乱切断了。当德军日益迫近华沙时，松亚只有带着还在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离开华沙前往世界的东方。通过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她终于踏上了日本列岛，一家三口得以团圆。两年以后，他们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住了三年。当他们转移到沿海城市天津定居时，小伊斯雷尔已是将近五岁的大男孩了。

那时的中国，已经从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沦为受众多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迎来了共和，但革命的果实很快即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所篡夺。出现的是一片军阀混战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你争我夺，力求在中国扩大其势力范围。这时，根据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控制了全国十几个通商口岸。尤其狠毒的是，强迫中国政府同意在这些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外国的“租

界”，由他们直接管理。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中国政府无权行使行政、司法、警察和收税的权力，成了十足的由外国人统治的殖民地。于是，星罗棋布的“租界”，就像一个个毒瘤，生长在中国机体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残害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基地。租界里烟窟、妓院、赌场林立，成为藏污纳垢和制造罪恶的渊藪。

在全国十几个通商口岸中，天津之出现租界虽不是最早的，但租界之多却居于首位。从1860年开始直到1902年，天津陆续建立了英、美、法、德、日、俄、意、比、奥九个国家的租界。每个租界，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好像这里已不是中国的国土。住在租界里的洋人，把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叫做“中国城”，简直就像旧金山的美国人把华人聚居的地区称为“唐人街”一样的心理状态。

爱泼斯坦一家在英租界里租了一套公寓房住，不像那些有钱的外国人能自己买别墅、雇中国保姆来带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他父亲做点进出口小生意来维持。和其他外国小孩一样，爱泼斯坦上的也是只收外国学生的学校，小学是美国人办的，中学进的是英国学校。这种学校，一律按英美国内办学方针办。学校虽然建在中国，却从不让学生学中文。因此，爱泼斯坦从小失去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机会。对于一个一生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但是，对爱泼斯坦的教育，还有另一个渠道，而且是最重要的渠道，那就是他的家庭。父母经常告诫他：“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绝不能再歧视任何人。”如果发现他用什么有损于中国人的脏字眼，父母总是要狠狠地予以批评。因此，他很幸运，没有沾染上殖民主义意识。他从小就懂得，人应该是平等的，民族歧视是不对的。10岁时，他目睹几个外

国孩子合伙殴打一个中国男孩，他于是毫不犹豫地马上加入进去，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男孩。

每天放学回家，爱泼斯坦除了做学校作业，总喜欢钻到父亲的书房去东翻西看，墙上挂的是满脸大胡子的马克思的肖像，书架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报刊。他12岁时，父亲就让他读了《共产党宣言》。慢慢长大以后，他开始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产生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天津是中国的地方，为什么80万中国人却只能住在只占全市面积五分之一的所谓“中国城”里，而且到处是贫民窟。为什么总数不过几千的外国人却霸占了那五分之四的辽阔地盘，建立起自己的别墅、机关、银行、公园、俱乐部，并且有自己的军队和司法系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天津的生活，使爱泼斯坦直觉地加深了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特别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波涛汹涌的历史潮流，紧接着又把他这个渴望追求真理的青年推向现实生活的漩涡。他没有继续升学，15岁就当上了记者。从此，新闻工作把他带到斗争的第一线，使他在火热的生活中塑造着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

他曾经这样回忆过那一段历史：

“真正唤醒了我的的是中国人民自己掀起的革命运动，特别是1935年12月爆发的中国学生反抗日本侵略华北领土的运动。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国青年在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们不畏警察的刺刀和枪支，英勇斗争，激动地高呼口号，呼吁武装抗日，拯救祖国。同时，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些热情支持中国爱国青年的外国人，其中包括斯诺夫妇。”

斯诺是当时在宋庆龄帮助下秘密进入陕北根据地采访的少数几个外国记者之一，他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曾经在全世界引起对中国革命的普遍关注。爱泼斯

坦一直认为，与斯诺的认识并结为好友，对他自己的人生道路有过深刻影响。作为最早看到《红星照耀中国》初稿和照片的仅有的几个人之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业绩使他大为震动。

1937年中国的全民抗战爆发以后，爱泼斯坦也像斯诺一样，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当时，他是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奔走于硝烟弥漫的前线，报道那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浴血奋战的战士和人民。他听见过卢沟桥开战时的炮声，目击过天津市的争夺战，还在炮弹呼啸而过的台儿庄访问了取得胜利的战士和总指挥官李宗仁将军。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广州，他和举着火把的爱国游行队伍一起走向街头，进行现场采访。

就在广州的抗日救亡游行队伍中，爱泼斯坦第一次见到了他敬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并且从此与她建立了极其深厚的革命友谊。随后，他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在转移到香港后负责这个组织的对外宣传工作，主编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香港被日本占领后，他曾因此被关进集中营三个月。

在那个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展开长期搏斗的时代里，爱泼斯坦一直是一个自觉投入战斗的国际主义者。在他1939年出版的处女作《人民之战》一书中，他在“前言”里曾经这样说明过自己的立场：“我决心要帮助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为之服务。我认为，各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自卫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应当予以支持。我既然身在中国，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

有人问过爱泼斯坦：在那战争年代里，使你最难忘的事件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1944年的延安之行。”为什

么？“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从他在这次访问之后所写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人们不难看出，爱泼斯坦无论在思想境界还是写作技巧上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在这本书里，他已远非限于所见所闻，而是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和战后将面临的问题。这时候，作者的视野已进一步扩展到了风云激变的整个亚洲。从国际主义眼光出发，他把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作为日益觉醒的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挣脱殖民主义奴役枷锁的典范，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这本书一问世，就被斯诺称赞为：“充满正确的判断和精辟的见解，出色地把旅行和历史、人物、事物融为一体。”

爱泼斯坦的一生中，只有十年不在中国，其中包括自1945到1951年寄居美国的六年。这六年，对于爱泼斯坦和邱茉莉夫妇来说，不过是战斗场所的转移而已。他们认为，这时候，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极为重要。不顾美国当时白色恐怖的威胁。他们积极地投入当地的进步运动。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友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他们和朋友们在纽约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高唱已被定为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跳起了中国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此时此刻，爱泼斯坦激动万分。在1936年抗战前夕，这支响彻中国大地的雄壮歌曲，已使他和中国人民一样兴奋不已。如今，他的政治敏感使他立刻意识到：“这支歌曲地位的改变，反映了整个历史的转折。”

1951的盛夏，爱泼斯坦和他的夫人邱茉莉，终于又回到了他们心向往之的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次，他们是应宋

庆龄之邀，回来参加对外介绍人民共和国的宣传事业，共同创办英文杂志 CHINA RECONSTRUCTS，中文刊名是《中国建设》（自 1990 年起改名 CHINA TODAY，《今日中国》）。从此，爱泼斯坦的生活，也和中国的历史一样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和所有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爱泼斯坦深知“解放”这两个字的含义，为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而兴奋不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主席的洪亮声音久久在他耳边回荡，他也最欣赏这个震撼世界的庄严宣告。对此，他有过这样的精辟见解：

“中国已经走向旧中国的反面。中国已经完全独立。它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处境和一百年来屈从地位，而且完全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这已经为朝鲜战争所证明，也为一切超级大国企图颠覆、控制或摆布它都不能不宣告失败所证明。

“有一点任何人都应当忽视，那就是：赢得世界承认和尊敬的不仅是个中国，而是一个革命的中国。

“旧中国，有着辽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和古老的文化；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于被人视为一个被控制和分割的对象。是中国的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才使它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主要角色，而不是一个道具。”

在他十分敬重的宋庆龄的领导下，编辑一本她所创办的向外介绍新中国的杂志，对于爱泼斯坦真好似如鱼得水，可以为实现理想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了。在创办《中国建设》之初，在北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不得不到公园里找个地方讨论工作。就因为有这样一股精神，这本杂志不仅办起来了，而且越办越好，越办越大，如今已成为拥有多种外文版、行销世界各国的颇有影响的刊物。作为这个刊物早期的执行编辑和后来的总编辑，爱泼斯坦长年累月呕心沥血的工作，不仅为塑造杂志的性格和特色奠定了基础，而且培养了

一大批对外宣传的人才，功不可没，有口皆碑。

这时候，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已形成爱泼斯坦的一种“天性”。他的注意力自然远远超过一本杂志，而是新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建国以来，他实际上为不断改进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发挥着一个“高级顾问”的作用。他应邀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英译稿的定稿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已成为在这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当他发现对外宣传工作存在什么带方向性的问题，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甚至将书面意见一直送到中央最高领导，执著地希望这一重要工作达到它的最佳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生日庆祝会上的《答谢辞》里，他也没有忘记提出批评和建议。也许人们会说，这简直已经成为了爱泼斯坦的“职业病”了。

与其说是“职业病”，不如说这种责任感已经浸入了爱泼斯坦的血液里，无处不表现出来。《中国建设》英文版付印之前，负责校对的同志最怕的就是爱泼斯坦看清样。因为，谁都知道，任何稿子，只要经过他的手，没有不改动的，有时甚至改成了一张“大花脸”。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任何改动都必将在印刷厂招来一大堆意见。然而，谁都不能不佩服他的改动就是有道理，有时甚至是避免了一个被疏忽过去的重要错误。

爱泼斯坦有一个习惯，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必提意见，重要的常常以书面形式表达。和他共事多年的老搭档，从他手里收到的“备忘录”可以说不计其数。在这些“备忘录”里，涉及的并非简单的编辑技术缺点，而往往是尚未引起大家注意的带方向性的问题。例如，1986年，在对外宣传中曾经刮起过一股风，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好像文章最好都非政治化。于是，在《中国建设》上一篇介绍陕西民俗风情的

文章，居然只字未提陕北曾经是革命根据地，更没有说明今天的风俗民情与当年的革命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爱泼斯坦认为，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备忘录”里，他写了这样一些话：

“‘立场’似乎已经变成一种过时的概念了。我们当然不能搞教条主义，但也决不能陷进自由化的模式，好像一个人甚至应该避免有一个立场似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我们就应该这样做：

“我们要宣传中国的革命，宣传人民共和国；

“我们要真实报道，而决不应该掩盖缺点；

“我们应当适当交待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

“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假如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就可以坦率地说明拖我们后腿的缺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加以回避或辩解。”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注意到，无论宣传工作中出现左的或右的倾向，爱泼斯坦常常都能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这与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中外历史知识，显然是分不开的。

人们还注意到，爱泼斯坦虽然还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模样，谈起中国的大事却常常比中国人还中国人。上到盘古开天，下至当今时事，他比许多中国人都更清楚，而且常常能从纵观世界的角度发表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这种见解，既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又容易为外国人所理解，往往让人听了心悦诚服。

因此，一些远道来华访问的特殊外宾、甚至代表团，点名要求把与爱泼斯坦的会晤作为一个重要节目列入其在京的日程。他总是挤出时间来满足这种要求，热忱坦率地向客人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甚至